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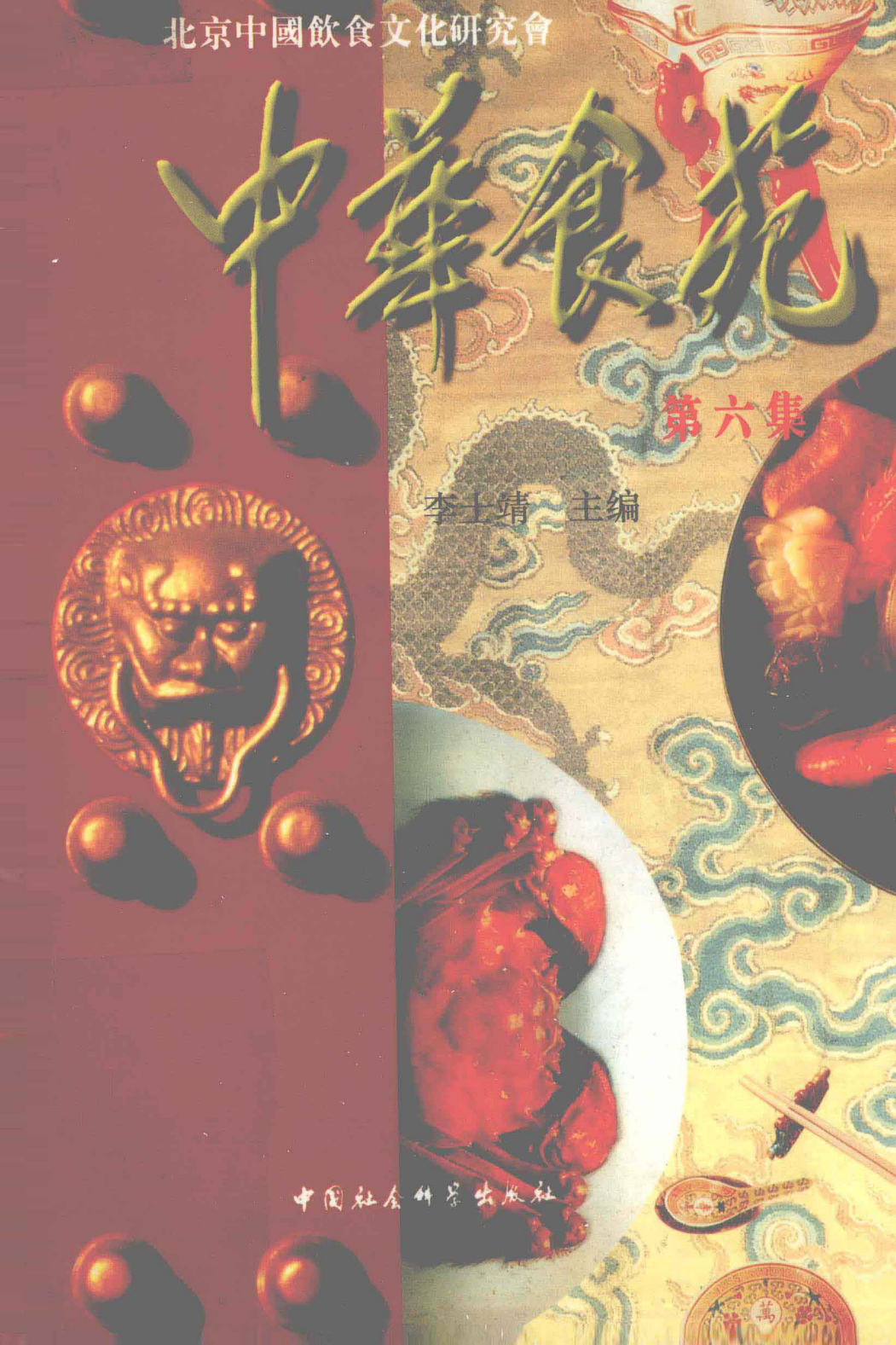
北京中國飲食文化研究會

中華食苑

第六集

李士靖 主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中國飲食文化叢書

北京中國飲食文化研究會

中華食苑

第 六 集

李士靖 主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30 號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中華食苑 第六集/李士靖主編.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 12

(中國飲食文化叢書)

ISBN 7-5004-1968-6

I. 中… II. 李… III. 飲食-文化-專題研究-中國 IV. G1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96) 第 18051 號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北京兆成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張: 12.5 插頁: 5

字數: 310 千字 印數: 1—5000 冊

定價: 50.00 圓

前 言

《中華食苑》論文第一集出版以後，引起海內外飲食文化界許多人士的關注，對這部中國飲食文化叢書的問世，給予熱情評價和殷切期望，並為《中華食苑》提供了題材廣泛、論述精闢、具有較高學術水平的稿件。經過本叢書編委會的收集整理，先後已有 9 集論文編輯就序，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相繼出版發行，預計到 1997 年初可將前 10 集出齊。為《中華食苑》賜稿的各界人士，有學識淵博、造詣頗深的前輩學者，有辛勤筆耕、學有成就的後起之秀，有從事理論研究的著名大學教授和博士，有食品餐飲業的企業家和科學技術專家。並有海內外知名的書法家、篆刻家、醫學家、教育家、史學家、考古學家、經濟學家給《中華食苑》題詞予以鼓勵。各方面的熱切關心和真摯的支持，更加激勵我們編委會繼續編印這部飲食文化叢書的信心和決心，要在多種學科、多層領域、多條渠道進一步擴大徵集文稿，提高編輯質量，加快出書進度，同心協力在 1997 年內實現《中華食苑》第 11 集至第 20 集的編輯計劃。並爭取能在海外出版發行，藉以開拓地區之間民族之間的飲食文化交流與合作。在具有劃時代歷史意義的世紀之交，迎來中華民族經濟振興騰飛、科學文化繁榮昌盛的千載難逢大好機遇，北京中國飲食文化研究會及《中華食苑》編輯委員會，願與學術界、文化界、經濟界同仁一道，為弘揚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飲食文化盡心竭力，為浩如煙海的中華食學寶庫增磚添瓦作出力所能及的奉獻！

前 言

衷心感謝各界人士對《中華食苑》的關心和支持。

衷心歡迎各界讀者對《中華食苑》的批評指正。

李 士 靖

1996 年 8 月於京華

《中華食苑》編輯委員會

顧 問 程思遠 孫孚凌
于若木 王文哲
姜 習 杜子端
龍永圖 王 純

主 編 李士靖

編 委 (按姓氏筆畫為序)

王仁興 王俊義
田宗相 李士靖
林永匡 馬 靜
胡文彬 洪光住
施寶華 唐是雯
馮佐哲 程清祥
楊瑚英 劉桂林

本集責任編委 馮佐哲

中華食苑發行紀念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孔

德成



欲讲文化

必先知味

中华饮食

寰宇之最

山珍海错

无美不备

弘杨光大

贵在吾辈

季羡林



一九九二年九月

目 錄

飲食考古與文物

- 新石器時代穀物加工在古代飲食文化中的意義 馬洪路 (3)
- 從考古發掘看湖北古代飲食文化 陳振裕 (21)

飲食史研究

- 先秦主食探究 胡志祥 (43)
- 論漢代的宴飲活動 彭 衛 (55)
-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飲料與果類 劉 馳 (79)
- 中國古代的“簋” 朱瑞熙 (91)
- 談遼、西夏、金時期的飲食 王曾瑜 (95)
- 元代的甘蔗種植和沙糖製造 季羨林 (104)
- 兩淮鹽商與揚州飲食 朱宇宙 (153)

烹飪文化

- 中國烹飪對人類飲食文化的偉大貢獻 孫萬國 (171)
- 中國烹飪的發達緣於養老論 高成蔭 (183)

2 目 錄

飲食文化的審美性	史 泓 (197)
家庭飲食風格及其文化透視	謝貴安 (204)

酒 文 化

中國酒文化	陳高華 彭 衛 史衛民 (215)
酒與經濟商業	徐少華 (244)
婚姻締結過程中酒的運用與作用	蕭家成 (251)
中國古代的黃酒工藝	周嘉華 (288)

民族飲食與食文化交流

鄂爾多斯蒙古族的飲食習俗	陳育寧 湯曉芳 (327)
中日飲食觀辨異	賈蕙萱 (341)
《馬可·波羅行記》與飲食文化	蔣 華 (362)

餐飲文化的研究與展望

從快餐食品的屬性看中國快餐業發展的戰略	楊銘鐸 (375)
從快餐經營的特點談如何發展中國的快餐業	黃文波 (379)
對中國高等烹飪教育及學科建設的構想	李志剛 練 濱 (389)
編後記	馮佐哲 (395)

飲食考古與文物

新石器時代穀物加工 在古代飲食文化中的意義

馬 洪 路

(中國考古學會 副研究員)

新石器時代是原始氏族社會發展的重要階段。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面貌如何，在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以前一直是不清楚的。地處黃河中游平原的河南裴李崗文化與河北磁山遺址的發現，引起了國內外考古界極大的關注。80 年代以後，陝西、山東和長江流域的湖南、江西各地相繼發掘了一批新石器時代早期不同階段的重要遺址，特別是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對探討中國農業的起源和畜牧業的產生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在研究中國農業起源及古代飲食文化的相關課題中，對新石器時代穀物加工方法的探討是至關重要的。

從出土遺物豐富且研究較多的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來看，其生產工具中石器製造工藝尤為突出，這就是帶柱狀足的石磨盤和石磨棒、有齒和無齒石鐮、有圓弧形刃的舌狀石鏟等。無論是琢製還是磨製，其造型都頗為美觀別致，也有很高的實用價值。這兩種文化的石磨盤及石鐮，使人見過之後便很難忘懷。看到這些製作較精的穀物加工和收

4 中華食苑·第六集

割工具，人們不禁會想到這樣兩個問題：這樣精美的農業生產工具的出現，是否意味著當時已經有了較為發達的農業？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它們為什麼後來反而很快消失了踪迹？

鑒於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本文擬就裴李崗和磁山文化的農業生產工具，談一點對新石器時代穀物加工方法演變的認識，以有助於對新石器時代農業生產和早期飲食文化的研究，拋磚引玉，並就教於識者。

一、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石磨盤的情況

長期以來，作為加工穀物的石磨盤和磨棒，一直被認為是原始氏族農業生產活動的重要標誌。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中說道：“自從我們的祖先經營農業之後，他們便能夠用自己生產的食物來滿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了。那時已經發明了一些簡單的穀物加工工具。如把穀物放在一種石製的研磨盤上，手執石棒或石餅反復碾磨，既可脫殼，又可磨碎。”^[1]權威性的《新中國的考古收穫》指出：“穀物加工用的石磨盤和磨棒，在各地也常有發現。”^[2]在有較大影響的考古學教材中，關於氏族社會穀物加工工具的描述是：“磨穀用的磨盤和磨棒，不但在農業地區而且在非農業地區都能見到，因為它也可以用來磨碎野生植物的籽粒。”^[3]在一些普及性讀物，如《中國原始社會》一書中也講到：“當時的糧食加工已經出現，在仰韶文化的很多遺址中都發現了研磨痕迹相當清楚的石磨盤、石磨棒、臼杵等糧食加工工具。”^[4]

由此可見，石磨盤和磨棒與農業的起源和發展似乎有著必然的聯繫，是原始氏族社會農業經濟的重要標誌。然而縱觀長達數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歷數幾千個遺址，我們注意到這樣兩個有普遍意義的特點：其一是石磨盤和石磨棒的出現大都早於仰韶文化時期（或稱前仰韶文化時期）以及仰韶文化較早階段；其二是農業不發達的北方地區，即

新疆、內蒙古、寧夏及東北三省發現最多，這些地區正是細石器工藝傳統流行的地區。而農業比較發達的仰韶文化晚期、龍山文化乃至原始農業頗為發達的馬家窖文化、大汶口文化、馬家浜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峽文化等等，都極少甚或不見石磨盤、石磨棒。據筆者粗略的統計，新石器時代發現石磨盤和磨棒的遺址，佔已調查和發掘的遺址不及百分之二、三，也就是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遺址沒有發現這類穀物加工工具。另一方面，不少遺址即使發現了石磨盤和磨棒，其數量比其他的耕種工具、收割工具也是微乎其微的。

我們僅舉幾個典型例子來說明。

1. 中原地區。在《西安半坡》的報告中，記述了 5275 件生產工具，在那樣大的氏族聚落裏，僅僅發現 2 件石磨盤和 5 件石磨棒可能用於穀物加工，報告也稱之為“碾磨穀物的工具”。1971 年，半坡遺址又一次進行了發掘，出土了 1 件磨棒，一端還有紅色粉末的遺痕^[5]，這就暗示我們以前半坡遺址出土的石磨盤和磨棒，也有可能并非全係碾磨穀物之用。廟底溝遺址發現仰韶和龍山文化時期的房子 3 座，灰坑近 300 個，墓葬 146 座，各種生產工具近 2500 件，但祇發現石磨盤 4 件，且其中屬仰韶文化時期的 3 件都較小。表面都附有紅色的痕迹，當為研磨赤鐵礦之用，屬手工業的生產工具，可能和農業沒有直接的關係^[6]。在漳河岸旁臺地上的磁縣下潘旺遺址，包含著仰韶、龍山、商、西周、東周、戰國乃至漢代的文化堆積，可知從氏族社會的繁榮階段起人們就一代代長期定居這裏。在其仰韶文化遺物中，陶器已有 18 種之多，可見當時經濟生活比較發達^[7]。但是該遺址中無論仰韶文化遺存的不同類型，還是龍山文化，都沒有石磨盤發現。地處黃河岸邊的孟津縣小潘溝遺址，是個以龍山文化為主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面積約 20 萬平方米，堆積厚 3 米左右，上面也有西周到戰國的遺迹。在其龍山文化層發現了房址、灰坑和墓葬，出土了不少石、陶、骨、蚌

6 中華食苑·第六集

製生產工具，特別是眾多酒器的出土說明當時農業生產已很發達，穀物加工應發展到較先進階段。但無論是房址，還是灰坑和墓葬，都沒發現石磨盤和磨棒^[8]。

在中原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數以千計的遺址中，絕大多數沒有發現石磨盤和磨棒，其例子是不勝枚舉的。

2. 黃河上游甘肅青海地區。這一帶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和早期銅器時代遺址都極少見到石磨盤和磨棒。青海樂都柳灣遺址，是建國以來的重大考古收穫之一。從1974年至1976年，共發掘馬家窑文化墓葬668座、齊家文化墓葬394座，出土了大批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和裝飾品。其中的馬廠類型墓地，已反映出有發達的農業，一半以上墓葬中都有容積較大的裝有糧食的粗陶甕作為隨葬品，有的墓還不止隨葬一甕糧食。大量的墓中都有生產工具隨葬。然而這個遺址全部馬家窑文化和齊家文化的遺物中，都沒有發現石磨盤和石磨棒^[9]。甘肅臨夏的廣河地巴坪遺址，發現了半山類型墓葬66座，也沒有石磨盤一類穀物加工工具^[10]。臨夏的范家村、馬家灣，蘭州的雁兒灣等馬家窑文化遺址，臨夏的姬家川、大河莊、秦魏家及永靖的張家嘴等齊家文化或辛店文化遺址，都沒有發現石磨盤和磨棒。其他的許多遺址也是這樣。因此，我們根據目前所發表的材料可以判斷，在黃河上游的甘肅、青海及周邊地區，馬家窑文化各期和齊家文化時期，大概很少用石磨盤和磨棒來加工穀物。在秦魏家，雖然在不同地點分別出土了一件石磨盤和一件石磨棒，但卻都遺有赭石粉末，顯係研磨顏料所致，而且磨盤形制小巧，看來不是用於穀物加工的^[11]。

3. 在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諸遺址中，更難見到加工穀物的石磨盤、石磨棒的蹤迹了。山東兗州王因遺址，是大汶口文化較早階段的重要遺址，總面積達4萬平方米，到目前已揭露7千平方米，清理大汶口文化墓葬800餘座，房址十餘座，窖穴和灰坑近百個。大汶口文

化的先民在這裏居住長達千年，主要從事農業生產。這從大量用於炊煮的陶器和穿孔石鏟可以得到證明。在這個埋藏豐富的遺址中，沒有報道石磨盤和磨棒^[12]。膠縣三里河遺址，從大汶口文化最早居民開始就以農業生產為主，直到典型龍山文化末期階級的產生和飲食文化的發達，歷經 2000 年。遺址中發現了大型窖穴和庫房，並在窖穴內遺留有體積達 1 立方米以上的粟，可知這種作物當時的種植和收穫量已相當可觀。然而，儘管遺址發現了 160 座墓葬、60 多個窖穴和一些房屋等文化遺存，出土了相當豐富的陶器、石器、玉器和骨、角、蚌、牙器具，卻沒見到加工穀物的石磨盤和磨棒^[13]。這些現象表明，在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以及相類似的原始文化（三里河遺址的文化面貌略有別於大汶口）時期，儘管農業生產已較發達，穀物已普遍生產並收穫量較多，但基本上不用石磨盤和磨棒進行糧食加工。大汶口遺址僅採集到一件石磨盤，而其他重要遺址如鄒縣野店、日照東海峪、蓬萊紫荊山和曲阜西夏侯等等，都沒有發現石磨盤和磨棒，僅在相近的江蘇邳縣劉林遺址發現過幾件石磨棒。上述情況表明，黃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的先民也是幾乎不用碾磨的方法來加工穀物的。

4. 長江下游的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也不使用或極少使用石磨盤、磨棒來碾磨穀物。江蘇常州的圩墩遺址，是一處馬家浜文化的重要遺址，兩次發掘共清理墓葬 87 座，出土了很多生產工具。雖然關於此遺址的氏族經濟生活和社會發展階段還不能就此做出肯定的結論，但已經有了原始的鋤耕農業是沒有問題的。當時的石器製作已經使用了一種新的方法，即選取適當的石材先行加工磨製，然後再鋸切成所需要的器型進行第二次加工，製成適用的石器，這或可認為是石器製造工藝的一種革新方法^[14]。在具有這樣較為發達的石器製造工藝並有鋤耕農業的文化遺址中，也沒有報道任何一件用於加工穀物的石磨盤和磨棒^[15]。到了新石器時代末期，在吳興錢山漾、南京鎮金村等大